

讀韋君宜《思痛錄》隨想

• 趙 誠



韋君宜這位老革命、出版界名人、人民文學出版社前社長，為了出版《思痛錄》這本講真話的書幾經周折，並在一些敏感的話題上作了刪節，此書才得以面世。這雖然給讀者留下了不能盡覽全稿的遺憾，但書中還是保留了作者在這六十多年來對政治生活中許多基本問題的深刻反思。

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韋君宜先生的《思痛錄》。聽說韋君宜這位老革命、中國出版界的名人、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前社長，為了出版這本講真話的書幾經周折，

而且在一些敏感的話題上進行了刪節，此書才得以面世。這雖然給讀者留下了不能盡覽全稿的遺憾，但書中還是保留了作者在這六十多年來對政治生活中許多基本問題的深刻反思。

讀了這本書，在一個個活生生的事例和作者沉痛的思考面前，不得不讓人掩卷長思，進而提出一連串問題：為甚麼美麗的理想竟會變成一場人間悲劇？為甚麼一個以革命為目的的政治集團，先是在自己的根據地，後是在全國範圍內，不斷在自己忠實的同志中、在國家現代化最稀缺的資源——知識界精英中、在善良正直的人民中，一次又一次地製造冤假錯案？而且到了冤獄遍滿中國時，領導人還樂此不疲。為甚麼西方國家的公民可以公開批評國家領導人，而在中國，即使像彭德懷這樣的開國元勳，在批評國家領導人的錯誤後也難逃家破人亡的厄運？在中國，為甚麼某一階層出身的人被非法殺害之後，法律卻不能追究兇手？為甚麼會拿人



韋君宜(圖)在《思痛錄》裏指出，曾經獻身這場革命的人在愛國熱情的支配下拋棄了學業，踏上了救亡、革命的道路，最終卻換來一場人生悲劇。她說：「現在我在幹這些，在當編輯，編造這些謊話，誣陷我的同學、朋友和同志，以幫助作者胡說八道作為我的『任務』。我清夜捫心，能不慚愧、不懺悔嗎？」

不當人？為甚麼當局者有權力把無辜的普通人「平衡」成右派而毀掉他的一生，甚至把自己的國民折騰得飢腸轆轆、餓殍遍野？是以革命的名義？革命是為了革掉腐朽政治制度的命，難道人民的國家建立後，為了鞏固其制度就可以剝奪無數無辜者的生命和幸福？是以理想的名義？為了領袖或政治集團的高尚理想，就可以隨便剝奪無辜者的幸福和生命，可以把全民族拋入煉獄之中？抑或是這場革命所選擇的道路原本就是錯誤的？還是這個革命的過程使在凶險的政治鬥爭度日的領導人逐漸放棄了自己的目標，而變成了權力狂和迫害狂？是權力腐蝕人，掌握了不受控政權就一定要墮落、一定要禍國殃民？還是這僅是一場誤會，原來這場革命的目的就是一些人為了爭天下、當皇帝，僅僅是用了現代革命的旗號？更令人悲哀的是，為甚麼在革命中建立的人民國家裏，人民對於以他們的名義掌握着社會公共權力的人的任意胡為卻毫無辦法？

韋君宜在《思痛錄》裏指出，曾經獻身這場革命的人中，有很多是當時在學校裏才華卓著的學生，如果他們在較好的條件下發展學術，一定能有較大的成就。但是，他們在愛國熱情的支配下拋棄了學業，踏上了救亡、革命的道路，最終卻換來一場人生悲劇。在革命的隊伍中，先是為了理想，後是為了生存，韋君宜不得不做了違心的事情。文革中，韋君宜就認識到這種無能為力的可悲，她說①：

後來我想了很多很多該懺悔的事情。我為甚麼拋棄了舒適的生活來革命呢？是為了在革命隊伍裏可以做官發財嗎？當然不是。是認為這裏有真理，有可以救中國的真理！值得為此拋掉個人的一切。那又為甚麼搞文學呢？自然不是為了掙稿費或出名，是覺得文學可以反映我們這隊伍裏一切動人的、可歌可泣的生活，叫人不要忘記。但是現在我在幹這些，在當編輯，編造這些謊話，誣陷我的同學、朋友和同志，以

1957年以後中國社會出現的逆向淘汰機制，使整個國家領導層中充斥着平庸之輩，他們只會提拔那些比自己資質更平庸、更拙劣的人。後來在體制轉軌、出現大量權力尋租機會時，吏治敗壞到無廉恥可言，這與1957年的反右運動以後建立起來的社會獎罰機制有着重大關係。

幫助作者胡說八道作為我的「任務」。我清夜捫心，能不慚愧、不懺悔嗎？這一點自知之明，我早就有了。

在李興華右派案中，韋君宜是一個不自覺的盲從者，她自省道：「這可以算作盲從，可是這盲從卻造成了慘痛的結果。盲從者怎不感到傷痛和懺悔呢？光懺悔還不夠，應當認真深思造成悲劇的根源。」^②這些年來，過去一些位高权重的人在回憶錄中對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錯誤進行了懺悔，但他們總愛找一些客觀原因說是事出有因，只是沒有頂住上面的壓力搞了擴大。還有一些人對自己的過去總是躲躲閃閃。韋君宜坦誠地懺悔，顯出那一代大學生的基本底色，不但使人對他們當年的真誠追求肅然起敬，也為他們後來的人生悲劇深感痛惜。由此，想起當年為了救亡而投筆從戎的熱血青年們，走了韋君宜道路的人無疑是悲劇。當時參加了政府軍，後來也受到了非歷史的對待，他們的人生同樣也是一齣悲劇。其中參加青年遠征軍的西南聯大學生，他們後來在中國的悲劇命運近幾年已有人提及。其實，這些都是中華民族的大不幸。

韋君宜還重點指出，在文革的前期和後期，絕大多數中國人對文革的態度都起了巨大變化。韋君宜一家在文革後期的「家庭政治小組會」，是許多關心祖國命運的家庭的真實寫照。從那時起，很多人都克服了迷信和盲從，文革前期許多積極跟隨錯誤決策的人，在後期都與那條禍國殃民的路線拉開了距離。無休止的政治迫害，甚至逼得韋君宜的丈夫楊述這樣一個從不懷疑黨的決策、一向嚴守黨的守密紀律的

「石頭也要說話了」。在眾多的倒行逆施下，韋君宜的一個書呆子同事，「這位最初熱烈信仰『文革』一切最高指示的老實人」老王，在1976年四五運動慘遭鎮壓後，面對天安門淋漓的鮮血，也不避斧鉞、義無反顧地秘密編印了鉛印本《天安門詩抄》^③。從這一點看，即使在最黑暗的歲月裏，也不能泯滅中國人民的良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助之人天下順之，寡助之人親戚叛之」，看來這真是不爽之天道！韋君宜還深刻地指出，文革「所有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歸之於『四人幫』，這夠了嗎？我看是還不夠」^④。

此外，韋君宜亦指出1957年反右運動的後果與文化大革命的關係。一個民族的「骨鯁敢言之士全成了右派，這怎麼能不發生後來的『文化大革命』！」這些敢言之士都是關心國家命運的社會精英，他們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已經成了嶄露才華的國之英才。但在那個「陽謀」中，他們慘遭迫害，多少人為之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從這時候起唯唯諾諾、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損人利己等等極壞的作風開始風行。有這些壞作風的人，不但不受批鬥，甚至還受表揚、受重用。」^⑤從此，中國「正氣下降，邪氣上升」^⑥。事實上，這幾乎就是一個民族在國家權力所及的絕大多數領域內逆向淘汰的開始。有創新思想的人被淘汰，只會跟着領導思想走的人得以提升；敢於直言的人被淘汰，阿諛諂媚之徒大行其道，追求真理、關心公共利益的人倒霉，不問對錯、盲從領導、昧着良知追隨領導的人升官得利，這就是1957年以後中國社

會的獎罰機制。逆向淘汰的結果是使整個國家的領導層中充斥着平庸之輩，他們只會提拔那些比自己資質更平庸、更拙劣的人。這種獎罰機制的另一個重要社會後果就是把人變得自私，因為在這種獎罰機制下，人如果不麻木不仁、不自私自利的活着，他就可能飛來橫禍。後來在體制轉軌、出現大量權力尋租機會時，道德防線幾乎一瀉千里的崩潰，吏治敗壞到無廉恥可言，這與1957年的反右運動以後建立起來的社會獎罰機制有着重大關係。

韋君宜對丈夫楊述的痛苦心路歷程的描述叫人心動、令人感歎。的確，對這些從年輕時代就有信仰追求的人來說，當他們遭逢迫害時，其在精神上的痛苦遠比肉體上的痛苦來的更嚴重①：

實際上他最感到痛苦的還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對黨、對馬列主義、對領袖的信仰，當做耍猴兒的戲具，一再耍弄。他曾經以信仰來代替自己的思想，大家現在叫這個為「現代迷信」，他就是這麼一個典型的老一代的信徒。但是，人家那種殘酷的遊戲終於迫使他對於自己這宗教式的信仰發生疑問。這點疑問是不容易發生的啊！是付出了心靈中最痛苦的代價的！

韋君宜非常希望和年輕人溝通，她表示②：

我要哭着說：年輕人啊，請你們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犧牲吧！這些老年人，而且是老黨員，實際是以他們的生命作為代價，換來了今天思想解放的局面的。

按我的理解，她說的「思想解放的局面」不僅是指民間的，因為民間的思想解放實際上已經在文革後期開始了。這裏，更可能是指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出現在中共高層的思想解放局面。這個局面的出現，與中共的老革命們受迫害後的覺悟有重大關係。但是我們在這裏不禁要問：若非有大批中共高層幹部在文革中受迫害，是否仍能出現這種局面？

在痛定思痛後，韋君宜希望在生前不再做助紂為虐的違心之事，她說③：

更應該慚愧、沒臉見人的是我自己和我們這些知識份子幹部，跟着那種丑角去參觀，甚至還隨着幫腔，點頭讚揚，閉眼不管，還簽字……這是幹的甚麼？是不是幫同禍國殃民？我們能夠不再這麼幹了嗎？我只希望自己在沒有去見馬克思之前，能堅持這十分可憐的一條，不再幫這種腔，不再點這種頭，想想古人，好像該並不難做到這。

但願現在中國的知識份子幹部都能以此書為鑒，能堅持這一點做正直人的道德水準。

註釋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頁169；88；156；114；50；51；117；134；142。

趙誠 1952年生，現職山西行政學院講師。

韋君宜希望不再做違心之事，她說：「更應該慚愧、沒臉見人的是我自己和我們這些知識份子幹部。我只希望自己在沒有去見馬克思之前，能堅持這十分可憐的一條，不再幫這種腔，不再點這種頭，想想古人，好像該並不難做到這。」